

中、韩
双语版



陈江风◎主编

진강풍

중국 전통 문화 안내

中國傳統文化導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中國傳統文化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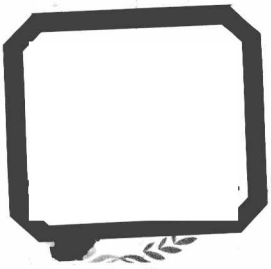
중국의 전통 문화 연구



陈江风◎主编

진강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选取传统的有代表意义的文化亮点和主要元典重点介绍,揭示中国文化的精髓、要义,意在顺应中国文化复兴的新形势。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经典与传统分为政治文化经典、史学传统、先秦诸子和总集别集等四章,下编文化与文人生活包括三教合流、宗法与郡县、职官科举、琴棋诗酒、天文地理和古代医学传统等六章。本书以中文和韩文双语编写出版,面向国内、国际各类读者推介和普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本书适合作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韩语、中文、对外汉语等)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教材,也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及韩语爱好者学习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 陈江风主编. --北京: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124-0717-6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化—概念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9989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陈江风 主 编

责任编辑 张胜强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邮编 100191) <http://www.buaapress.com.cn>

发行部电话:(010) 82317024 传真:(010) 82328026

读者信箱: bhpress@263.net 邮购电话:(010) 82316936

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7 字数: 743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978-7-5124-0717-6 定价: 45.00 元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编委会

主任委员 陈江风 教授 郑州轻工业学院副院长
副主任委员 张光军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
郭尚兴 教授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生导师
李景文 研究员 河南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淑萍 教授 郑州轻工业学院外语系主任

中文卷编写组

陈江风、于兆军、朱腾云、李景文、王鹏廷、刘德杰、杜红亮

韩国语翻译组

李爱子、张炎钰、徐迎迎、仝宇飞、夏月亮

韩国语主审

张光军、牛林杰

编委会秘书

王铮、王妩明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范围	1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6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概说	11

上编 经典与传统

第一章 十三经:政治、文化经典

第一节 经学概说	21
第二节 十三经	28
第三节 经学传统	33

第二章 正史与谱学:史学传统

第一节 史部概说	37
第二节 二十四史	41
第三节 谱牒之学	47
第四节 史学传统	49

第三章 先秦诸子:思想渊源

第一节 诸子概说	52
第二节 先秦诸子	59
第三节 子学传统	63

第四章 总集、别集:文学渊薮

第一节 集部概说	66
第二节 文学脉络(上)	69
第三节 文学脉络(下)	73
第四节 文学基本特征	81

下编 文化与文人生活

第五章 三教合流:宗教特征

第一节	三教概说	87
第二节	圣贤崇拜	89
第三节	神仙企慕	93
第四节	佛陀礼敬	98

第六章 宗法与郡县:政治制度

第一节	宗法制概说	103
第二节	分封制	108
第三节	郡县制	112

第七章 职官科举:选官与教育制度

第一节	中央官制概略	116
第二节	察举和科举	120
第三节	学校与书院	125

第八章 琴棋诗酒:文人雅趣

第一节	雅趣传统	131
第二节	琴棋书画	133
第三节	金石茶酒	139

第九章 天文地理:古代科技的曙光

第一节	天国的框架	145
第二节	天文、阴阳五行与八卦	148
第三节	天文与历法	152
第四节	地理之学	156

第十章 宝命全形:古代医学传统

第一节	中医概说	160
第二节	预防与养生	166
第三节	中药与药典	172

后 记	177
-----------	-----

绪 论

随着世界文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趋同,全球现代化共同祖述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以科技主义的文化态度对待自然和生活。经济全球化在带来社会、经济与技术飞速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道德问题、人文缺失、资源危机、环境问题和一系列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现实的反思,动摇了西方现代文明独尊的地位,多元文化理论重新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以中国为例,一方面,西方文明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渐行渐远,以至于当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相当的陌生;另一方面,人们又从传统文化中发现了“和谐”等一系列传统理论,有可能成为医治现代化病症的良药。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希望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也在寻找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理论依据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了使人们初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与魅力,本书选取中国传统精神、制度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选取传统的有代表意义的文化亮点和主要元典,做一些入门性质的普及推介工作,以求收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范围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历史创造,展示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所做的独特贡献。作为中国文化入门的导读,在具体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些相关的基本概念和知识。

一、文化与文明

文化是人在观念指导下的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统一,是一个动态系统。从过程的意义上看,文化一方面是在自然中不断创造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对人和自然不断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即不断人化的过程。只有充分认识文化在这两方面的价值,理解人的文化创造还包含着对人自身的改造,文化研究才更有意义,文化建设才更有针对性。在众说纷纭的文化概念中,这种认识和中国传统意义的“文化”概念较为接近。

在中文中,“文化”是“文”与“化”两个字组成的词语。见之于殷商甲骨文的“文”字,像一个袒胸而立,身有花纹文饰的人,引申为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所谓“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所谓“五色成文而不乱”已说得很清楚;而许慎《说文解字》所谓“文,错画也,象交文”则讲得更明白。由此进一步引申为文字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含义。因为与五色成文有关,“文”字又有了与“质”、“实”相对的含义,引申为精神修养、德行美善之义。《论语》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汉儒郑玄注《礼记》时说:“文犹美也,善也。”可见,“文”字早在远古,便已与今天的“文化”一词有了不解之缘。“化”是一个动词,本义指事物动态的变化过程。如《易·系辞》所说的“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和《礼记·中庸》“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表达的都是这层意思。由此又衍生出造化、大化等义,并由自然万物(造化)的生成、变易,引申出对伦理道德、社会文明的化入人心等教育与塑造过程的表达。

“文”、“化”二字的复合使用,有一个过程。《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天文与人文相辅相成,共同阐述文化道理。“天文”指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和天象呈现的状态,“人文”指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社会关系、人伦规范和风土民情。这段话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在传统政治和文化思想领域具体运用的集中显现,它讲究治理国家,必须通过观察天象变化,把握自然规律和时令变化。同

时,对于人间生活百态,要像尊重天文时令变化一样,因势利导,随宜教化,以求得理想治局的实现。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相关联,“因文教化”或“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形成。这一思想促成了“文化”作为独立概念的产生。到西汉的刘向作《说苑》开始将“文”、“化”二字联为一词。他在《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其后,晋人束皙在《补亡诗·由仪》中提出“时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意思是“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①,武力是文化不奏效以后的政治策略。很明显,在古汉语的表达系统中,“文化”一词,本义是与“武功”、“武力”相对的概念,指以文德教化天下,这里面既有政治主张,又有伦理意义。

作为近代翻译语汇的“文化”,是从日语中借用过来的。该词的原型是拉丁文 *Cultura*,有耕作、居住等多重含义。英文写为“*Culture*”,含有改良土壤、栽培植物、种植树木、饲养牲畜等含义。这种用法至今保留在 *agriculture*(农业)和 *horticulture*(园艺)一类英语词汇中。《牛津词典》说1510年以后“*Culture*”一词开始具有精神、人文意义,词义中含有了为增进某种东西的质量而做的努力一类义项。后来逐渐引申出神明崇拜、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含义。这就与古汉语中“文化”所具有的“文治教化”的义项比较接近。所以,学者们使用它来对译 *Culture* 这一外来语汇。

显然,古汉语的“文化”与西方传统的“*Culture*”在词义上有着明显区别。“文化”强调人的教育过程和以教育为目的的社会化活动,偏重于精神领域和人本身;而“*Culture*”则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逐渐引申到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尚书·舜典》说:“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对于这段话,唐朝人孔颖达注释说:“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舜既有深远之智,又有文明温恭之德,信能充实上下也。”《易·贲卦·彖传》说:“文明以止,人文也。”晋人王弼注释说:“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用此文明之道,截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可见古汉语“文明”的最初用法有光明、睿智、文德彰显的含义,其义项与文化有部分交叉。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在文化的启蒙过程中,大量的西方术语引入我国。学术界始用“文明”一词来对译英文中的“*Civilization*”。该英文词来源于拉丁文,本身具有两方面的含义:1.文雅之义。2.政治方面的意义,与国家的概念相对应。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国家”的含义。这一含义,我们通常译为“城邦”。而在城市里居住的市民,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特殊地位,而且在生活态度上也较文雅、进步。因此,现代意义的“文明”概念不同于古汉语,它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物,与个体家庭、私有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产生大体上相对应。

从现代意义上讲,“文化”与“文明”是两个概念。它们既相联系,又有区别。概括地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文明则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显现。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人们称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中国为四大文明古国,而不称其为文化古国。

二、文化的结构与分类

“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对文化理解的广泛性。对此,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A. Lawrence Lowell, 1856—1942年)形象地表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规范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

^① 萧统:《文选》卷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272页。

外,它无所不在。”^①文化的研究由于这一特点而更加扑朔迷离,同时也更加具有魅力。因此,在研究中,不仅文化的概念五花八门,而且,对于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比如文化的基本结构和分类等,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例如,从时间角度上,文化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等;从空间角度上,可以分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从社会层面上,可以分为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等;从社会功能上,可以分为宗教文化、礼仪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这些从时间、空间或社会层面对文化所作的分类是从外在角度的划分。从文化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和层次上,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两个层次,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也有的学者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从这一视角所作的划分,无论是两层次说、三层次说,还是四层次说,所研究的都是文化本身的基本结构。其中,四层次说概括表达得比较完整。

物质文化又称物态文化,是人类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创造活动及其劳动产品的总和。物质文化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衣、食、住、行一类条件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的程度与结果,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一种可以感知的、具有物态实体的文化事物,是人类从事一切文化创造的基础。

精神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活动中升华出来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具体来说,精神文化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部分。社会心理指人们的日常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包括人们的情绪、愿望和要求等。社会意识形态是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往往是由社会的主导层面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升华,并以著作或其他形式做载体固定下来,流行传播,垂于后世。

行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复杂的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定势,是以民风 and 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生活中的、具有鲜明民族特性和地域特性的行为模式。一定的行为文化是一定的精神文化,尤其是观念文化在人们社会实践中的反映。

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的总和,包括婚姻、家庭、政治、经济、宗教等制度以及组织形式在内。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会活动要求人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否则,社会就会陷于无序。制度文化是解决、规范与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行为的文化,具有很强的调适性,因此,制度文化又称为调适文化。

在文化基本结构的诸部分中,物质文化是人类在适应自然的同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创造及其成果,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是人在建立社会、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创造及其行为的自觉,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精神文化是人在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主体意识的自觉及其精神创造能力和成果,反映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

在文化结构构成的诸层次中,外显的物质文化往往随着生产力这一最为活跃的因素的变革而迅速变革,它的外显的物质实体比较容易发生变化,因此,物质文化的形态成为考古学判断年代的重要依据。处于中层的制度文化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并由于统治阶级文化的改变而影响社会形态和人们的行为方式。而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则由于内化于人的心理,它长久地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形成民族独特的心理结构,最难于发生变化,其核心的部分是历史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长期对生活意义的体认。比如,对于外来文化,人们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是外来的物质文化,即外显的物质实体性文化;对中层的制度、行为文化已有很大的选择性;而对于深层的精神、心理文化则很难迅速认同和接受。西方人也是这样,他们

^① 转引自殷海光:《中国的文化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26页。

可以欣然接受中国发明的火药和鞭炮,却无法认同中国人用鞭炮驱鬼避邪的传统观念。文化差异的关键是深层文化观念的不同,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所致。

三、文化的功能

认识文化具有的功能,有利于加深对文化的理解;加深对一种文化的理解,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在研究一种文化入门阶段,首先要对其文化功能有粗浅的了解。

1. 文化的记忆与认知功能

文化记录着人类的活动历程和观念对象化的过程。在文字没有出现的年代,人们就通过口头语言,将经验、知识、观念口耳授受,代代相传。世界各民族的文字几乎都是在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依然沿袭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文化。

文字是人类天才的创造,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它极大地扩大了文化的记录功能,是民族文化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的甲骨文、古埃及的纸草文、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等,都为我们保存了早期人类社会的记录。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开始,经殷周金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代碑刻、晋以后的行书和草书,日臻完善,美轮美奂,不仅成就了中国文化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也让我们领略了先民的智慧和中华文化的韵律。随着造纸术、印刷术的出现,文字的记录功能更是无时不在,它保留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展示着一个民族的伟大创造力。文史经典、科学著作,以及后来的报纸杂志、音像媒体,无一不在发挥着文化的记录功能。人类正是凭借文化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持续开拓深广的认知领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化。

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也有记录功能。一种工具、一件兵器、一种生活用具、一个艺术装饰,都可以使我们感知到彼时彼地人们的精神岁月和实践活动,彼时彼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沧桑。秦朝兵马俑、汉代画像石,使我们神往秦汉王朝的风采;《清明上河图》使宋代都市繁华喧闹的生活图画历久弥新,跨越历史,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文化既然有记录功能,也就有认知功能。因为,人的认识过程总是受到文化理解的制约和规范。几千年流衍的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人,第一个用处就是它的认识价值。现存的古文化,无论是令人神往的故宫、家喻户晓的《红楼梦》,还是代代相传的二十四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面面历史的镜子。所以,古往今来中国政治家都念念不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训条。人类正是通过文化,不断积累经验,改进自己的思维方式,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从而逐渐认识自然,认识自身,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一部人类文化史既记忆着人类成长发展的历程和伟大创造,又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人类认识史。

2. 文化的传播功能

和文化的记录功能、认知功能相联系,文化还具有传播功能。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社会现象,它在社会交往中产生和发展,自然就会在社会交往中得到传播。时装风行,歌曲流传,知识普及,技术推广,靠的就是文化传播的功能。显然,这种传播,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可以在社会群体之内,也可以在社会群体之间,也可以跨越时空,千年承传。

言语和文字既是文化现象,又是文化的载体,其文化传播功能特别强。言语会传播,婴儿才会牙牙学语,于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数个国家,都能操同一种言语,各种信息得以交流和流传。文字会传播,恢弘的二十四史才能为我们送来中国古代社会诸多信息。实物也可以传播。古有丝绸之路,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和邻国、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时至今日,各种交易会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艺术节里精彩纷呈的节目,以及各种展览会、博物馆、体育竞技、学术报告等,无不在利用文化的传播功能促使文化广泛交流。而且,随

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文化传播功能会日臻完善。

3. 文化的教化和凝聚功能

人类的出现首先是分地域的,各地人群按照自己不同的方式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文化被人所创造以后,就成了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不同于自然的人造环境,我们称之为文化环境。文化一旦产生,就具有了一定的功能,这些功能反过来影响人、塑造人,执著地发挥其教化作用。

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父母教他学说话,教他识别器物,教他礼仪爱憎。长大后,学校教他学知识,教他做人。社会上各种规章制度,风俗习惯,言行举止,都在引导他适应社会。文化不仅通过固定方式、固定场合自觉教化人,更多的是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方式,不自觉地实施教化。在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文化使人按照社会的理想和价值标准逐步社会化,使人最大限度地削弱其动物性而成为社会的人、文化的人。

作为社会化的动物,人的生存与发展对社会存在着依赖性。正是因为人对社会的这种依赖性,文化的教化功能才能通过文化模式的范铸功能和社会价值观的濡染功能来实现。人所生活的环境,奉行什么样的文化模式,推广和灌输什么样的价值观,人就会通过接受教化的过程,通过不断处理与周边各种关系的过程,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以致最终内化成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的文化环境发生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审美趣味都会受教化功能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就是凭着对这一规律的自觉把握,历代统治者把教化百姓当成传统政治的第一要务。因为,对于社会而言,文化的教化功能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而我们要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克服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

文化有教化功能,也就有凝聚功能。因为文化可使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在同一文化类型或模式中得到教化,从而产生相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因而紧紧团结在一起,产生巨大的认同、抗异力量,文化史上称这一规律为“文化认同”。

传统中华文化的凝聚功能,主要表现为忠君与爱国。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三元里人民抗英、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历尽劫难,仍生生不息,这一功能的维系是最重要原因之一。历史发展到今天,忠君思想已经过时,但是,对国家、对事业的忠诚,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却仍然是我们高扬的旗帜。近代以来,中华振兴的历程,国人艰苦奋斗,默默奉献;海内外华人同心同德,捐资捐物,献计献策,靠的是文化的凝聚功能,靠的是爱国主义的维系力量。

爱国主义是文化价值观念的体现,属于精神文化范畴中的内层文化,因而它的凝聚力强,程度深,最稳固持久。至于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职业、共同的习惯、共同的经历等,则属于表层或中层文化,相对而言,其凝聚功能也趋于表面化。不同层面的文化凝聚功能,既有其积极方面,也有其消极方面。总的说来,凡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幸福安康的都是积极的,反之就是消极的。

四、传统文化导读的研究范围

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范围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大课题。广义地说,应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56个民族有史以来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总和。就目前情况看,传统文化教材大多选取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介绍。有鉴于此,本书拟侧重中国文化中的精神文化、观念、制度的形成、演变、沿革及文化元典、文人生活情趣的介绍,以期揭示中国文化的精髓要义。

对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含义,应作全面性理解。观念是意识、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除了哲学、宗教、思维方式、道德等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工艺、诗歌、书法

等同样表现出其精神价值,凝聚着人们的艺术观念、价值伦理观念和审美观念,因此也属于文化的研究对象。当然,科学技术思想、教育思想,也应该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虽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史不同于文化史,但是科学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这些带有华夏民族思维特色的精神产品属于观念形态的内容,如果不对这部分内容加以研究,便不能清楚阐明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

作为人类精神生产领域的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各种文化形式具有承传性,也就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历史过程,因此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研究价值和历史借鉴价值。对文化作理论的概括和历史的研究,既要认识文化和当时经济、政治的关系,更要找到文化现象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揭示其规律性,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既注意到它的历史性,又注意到它的共同性;既阐述文化基本结构的有机组成,又侧重其中精神文化等重要部分的规律探讨与揭示。其审视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包括哲学、宗教、科技思想、文学、艺术、教育、思维方式和习俗等文化门类的研讨,使学生建立起对于中国文化的—个概要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认识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入门的又一重要环节。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极其丰富,其基本特征的概括十分复杂,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首先,要立足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文化的特点来认识;其次,要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制度的基本社会特征来认识。按照这些原则分析,其最基本的特征可概括为如下方面。

一、注重伦理、道德至上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根基,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征,以区分六亲、九族的谱系为外延,以家族观念和血亲意识为纽带,代代承袭,广泛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之中,转化成中国人强烈的道德意识和伦理意识,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所言:“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是中国人的第二重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可以说,家庭与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这就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而家族,再结合成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因此,导致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孕育出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重要文化特征。

因此,“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集中体现了在家国同构的宗法观念下,个人被重重组织在群体之中的文化特点,同时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人伦关系的特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充满亲情。这种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实质上明确规定了家庭各个成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责任,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这就是儒家倡导的“人道亲亲”。由“亲亲”的观念出发,引申出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关系和一整套行为准则。其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原则。“百善孝为先”。“孝”的基本内容是“父为子纲”,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孝顺。这种道德信念延伸到社会组织中,衍生出“君为臣纲”,孝道就转化为治国之道,成为强化家国同构政治体制的重要纽带。于是,个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变成了对权威无条件的伦理服从。把

道德教化控制臣民的预设变为现实,形成传统社会“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传统。

将这种忠孝原则推广开来,用以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其基本的道德原则就是“能近取譬”(《论语·雍也》)——以自身做譬喻,以自己的感受去考虑如何对待别人,推行一种“推己及人”的方法。儒家先哲把它概括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等原则。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这些原则,到宋代被进一步发展成为“厚德载物”的思想。宋代哲学家张载明确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父母(即天地)所生的兄弟姐妹;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有道德的人,应以极其宽厚仁慈的爱心来对待自己的同类,进而推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人,一方面,要设身处地、爱人如己,另一方面,还要有爱护一切生命的博大胸怀。由此,形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伦理文化特色。

从崇尚伦理道德的原则出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内圣外王”(《庄子·天下》)之道,最终把它抬到了理想人格的高度,使伦理和道德理想主义风尚融入到每个人的社会实践中。此道即内重修养品德,外重实践能力,在政治上积极有为,实行“仁政”,以德治国。孔子认为,要把道德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中去,用道德手段治国安民,才能真正管好国家。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认为单纯用行政的、法律的办法管理人民,只能使他们因畏祸而守法,不能使他们具有道德观念。用道德的办法来教育、感化人民,用礼来约束他们,不仅能使之守法,还能使之具有道德自觉,心悦诚服地守法遵礼、知耻从善。不仅如此,执政者个人的道德品质,能够直接影响政令的执行,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并进而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以德治国的人,人民会像众星拱卫北极一样拥护他。从“仁政德治”思想出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人格完善,以“圣人”为修养的最高境界。人之所以要学习,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成为道德上的“完人”,而所有的一切,必须从修身开始,所以,《礼记·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就模式,不容置疑地成为历代士人实现“内圣外王”人格境界,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路径。

二、追求和谐统一的特征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本质的、一以贯之的精神,一种崇高而现实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这种理想与精神的核心是一个“和”字,我们称之为和谐或和谐统一。

汤一介先生说,如果我们能够重视中国文化“‘普遍和谐’的观念,并对它作出适应现代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应该说对今日和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张立文先生指出:“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是民族精神活生生的灵魂”。^①这种和谐的思想和文化精神不仅仅是一种逝去的文化传统,对于当今社会仍有其社会意义与强大的生命潜力。因此,它已然成为我们今天现实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回到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很容易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自觉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特色。这种关系包括两个侧面: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间的外在和谐关系,二是三者各自内部的和谐关系。

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坚持儒家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恕道”原则,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形成一种传统处世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和彼此间的联系,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具体说来,就是强调一事当前,要先

^① 张立文:《和合学概论》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页。

设身处地地为对方、他人着想,以对方、他人为重。在文化实践中,中国文化彰显的正是一种“仁者爱人”、“和为贵”的精神。

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坚持“中和为上”的致中和原则,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做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方面表现在个人与社会常有对立冲突。对立的原因,是每个个体都是血肉之躯。人人有所欲求,而社会又不可以满足人的所有欲求,这就必然会与社会发生冲突。统一的方面表现在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的,个人脱离社会就无法生存,而社会没有个人也就不成其为社会。所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上反对偏激,力排法家只重社会而忽略个人利益的极权政治,以及道家只求独善其身,而不问天下国家的消极态度,从而坚持“致中和”的原则,始终倡导保持一种“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的“中庸”和谐的处世态度,既积极用世,又注重自我约束和个人修养,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德”、“万物一体”和“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认为自然界和人类是一个统一的自然整体。人类既然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要以人道合天道,以人心合天心,以德合天德。总体上是要求以人生合于宇宙自然,视天地万物为一体。因此,从孟子到王阳明都在讲,听鸟之哀鸣,见兽之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这是人的仁德与鸟兽而为一体的思想。中国文化要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达到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人因为与天地合而为“三才”,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但人要限制在“尽万物之性”的范围内,开发自然资源,以求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不是一味地征服和索取。这种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生态科学主张的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相接近,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

除了处理人与上述三者间的和谐关系以外,中国文化还十分注意自然界内部、社会内部以及人的身心即人自身内部的和谐关系。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上述方方面面关系的长期探索和正确处理,确立起民族文化高扬和谐的文化特色。这种突出的文化特色的确立,有其至厚的哲学基础。如果进行哲学上的概括,可以归纳为三方面:

1. 和谐中的相反相成思想

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不是静止的,而是辩证的,具有鲜明的哲学智慧。当古希腊和古印度人专心于形式逻辑进而形成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在发展着自己的辩证逻辑思维。《老子》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范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他这里所说的“相成”都是相反事物的和谐相成,清楚地表达了事物间对立统一关系。《汉书·艺文志》明确地提出了“相反相成”的概念:“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这一理论深刻、简明地表述了事物之间既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统一和谐的关系。历代中国哲人以“统观”、“会通”的方式考察天人、形神、道器、心物、体用、阴阳、动静、知行等一系列范畴的相互联系,揭示出其相反相成、动态转化和对立统一的关系,表述了和谐的本质特征,因而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思考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和谐中的多样性统一特征

中国古典哲学中反映事物多样性统一的观点,主要有“唯齐非齐”说、“五行”说、“和同”说等。提出多样性统一思想的最早的文献是《尚书》。《尚书·吕刑》在谈到执法的宽严轻重应根据社会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时指出:“唯齐非齐,有伦有要。”认为整个世界的和谐统一正是由于万事万物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各有不同才是合理的。与此同时,《尚书·洪范》则从物质世界的构成角度,用“五行”学说来说明事物的多样性。书中说,周武王曾向殷纣王的叔父箕子请教治国方略,箕子向他阐述了九条治国的方略,第一条就是遵“五行”。所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

木,四曰金,五曰土”。箕子告诉周武王,从前夏朝人的祖先鲧治水时,没有及时疏浚水道,而是堵塞河道,打乱了五行运行的秩序,所以上天震怒,治国的常理被破坏,鲧因而被推上了断头台。箕子告诫人们,世上的事物各有本性和运行规律,违背了就要受惩罚。在这里,“五行”已经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证实了早期中国文化对世界多样性的认识与运用。“和同”说始于西周太史伯,成于孔子。《国语·郑语》中周幽王时的太史伯指出,事物不应“以同裨同”,而要由不同的要素组合谐调才是“和”,叫做“以他平他谓之和”。只有和谐,才能“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这就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主张君子在交往中应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强调保持独立的思想 and 个性,反对盲目苟同。孔子的“和同”关系说和继之的“中和”说,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思想资源。

3. 和谐思想的有机整体观

整体观又叫系统观。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里高津(Llya Prigogine)说,中国文化“是一种整体性的或现在我们常说的系统论的观点”^①。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是由中国人的宇宙有机整体观所决定的。中国古代较早并最终形成了以元气论为代表的有机自然观。“元气未分,浑沌为一”、“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由气论产生阴阳、五行、八卦以及宇宙整体模式,完成天地、四时和万物生成的过程。这种有机整体观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元气自然观总是先从宏观角度,指出宇宙整体的构成,然后再分析整体内部各个物体是怎样形成的。二、元气自然观始终把人、社会、自然看做一个有机整体,把人的生理、心理活动和社会的组合看做是自然的产物,反过来也把自然拟人化。这种有机整体文化观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极深,对中国古代科技,特别是农学、医学、天文学、历法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高扬理性精神、推行人文教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它一以贯之的理性主义的文化态度和不懈推行人文教化的传统。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形成,人们往往祖述孔夫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垂范作用。在儒学理性主义的指导下,中国文化从上古开始就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种传统具有超宗教的功能。大家知道,中国文化创造了一个代替宗教的东西,那就是儒家的“天”。天相当于宗教中的上帝,是最高存在,具有惩恶扬善的巨大威力。根据儒家的预设,统治者之所以获得统治天下的权力,是“天命”的赋予。然而,只有当天子的行为符合天的意志时,其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保证,而天意又是与儒家的道德同一的。违背天意,即违背儒家道统,政治就失去了合法性。这一原则简单概括为:天命无常,唯德是辅,唯道是处,这个道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

其实,这种理性主义的政治思想要早于孔子,最初是周代的创建者从殷商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认真整理,孟子及后学把周、孔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发扬光大,进而发展成为中国式的人文传统——“道统”。

所谓道统,即祖述中国文化之道的传承系统。孔子开创儒家学派时还没有系统的道统思想。该思想肇始于孟子,变形于董仲舒,拨乱反正并发展于王通,完成于韩愈。韩愈《原道》在明确这一传承系统时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这段话历来很受重视。首先,韩愈明确表述了中国文化的传道系统,确立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系。其次,第一次确切指出,周公以前的文化道统的承当者是尧、舜、禹、汤一类君主;自周公以下,道统的承当者是臣下,是士人。第三,上述界定意味着道统最初是道统与君统合一的,到周公、孔子之后,道统与君统一分为二,互相制约、相辅相

①【比利时】普里高津:《科学对我们是一种希望》,《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第3卷。

成,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自觉。

韩愈的道统学说是儒家君权有限合法性思想的重大发展,闪烁着中华文化理性主义人文思想的光辉。韩愈尊孟子为道统的最后传人,原因是“民贵君轻”、君权有限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到汉代,董仲舒一方面宣传“君权神授”,另一方面又以儒学独尊、天人感应的“谴告说”为政治立极,回到以天制衡君主权力的老路,明显偏离了孟子思想的轨道。到隋代,王通在《中说》一书中,重新阐发原始儒学君权有限合法思想,为韩愈的道统高于君统的“原道”理论奠定了基础。道统学说的真精神就在于冷静地赋予儒家文化制约皇权的地位。中国文化传统,只能由道统来保证,而不是由君统来保证;文化高于君权,道统高于君统思想,赋予文化以神圣的地位,属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虽然在执行时并不尽如人意,但它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主义的结晶。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视理性,而且重视人文教化。在中国历史上,维系社会伦理,调节个人心理平衡和精神生活,不仅靠上帝、神灵,而且依靠道德自律,推行风化,实施人文精神的教育与普及。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以礼乐精神为核心的人文教育。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蓝本,通过道德教育、礼乐熏陶、理性启蒙进行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的培养,使人不断“文”化,进入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

四、不尚玄虚、务实厚生的实用理性特征

与远神近人、民为邦本、中庸平和、自强不息的思想相应,中国文化在讲“崇德”的时候,始终不忘“利用厚生”,既追求精神实现,在上天的信仰中满足人的终极关怀和形上致思,又立足现实、关注民生,以日用伦常为中心,乐天知命,达观淡定,形成了开物成务、不尚玄虚、求是务实、利用厚生的实用理性传统。

求是务实、利用厚生的实用理性精神,其现实根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自然经济。农民历来是中国人的主体,他们在从事农业劳作的长期过程中,经验式地感受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空虚玄谈无补于事的道理,自然形成了一种务实、节俭的朴素性格。这种文化氛围的长期濡染和积淀,使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也形成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治学风格和“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王符《潜夫论·叙录》)的价值观念,以致最终陶冶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

以经世济民的人世精神而著名的儒家,也是一个以求是务实为特色的学派。《论语》中“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时习之”,“孔入太庙,每事问”,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求是思想。荀子否定生而知之,王充重实事,疾虚妄,宋明士人标举事功,清代朴学重考据与实证,使经世致用的天文、算术、农学、医学等应用科学以及“资治”的史学比较发达。因为孔子不反对言利,孟子呼吁要“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所以后世中国形成了崇德、广业、利用、厚生的传统,代代相袭,使工具和手工业制造得以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不仅在生产中自给自足,而且十分注重民生,形成了“民以食为天”的风俗和令人垂青的美食文化。

这种鉴于农业经验为基础的实用理性有其局限性。中国人受农业简单再生产过程的影响,养成了重视实践、注意经验观察和直觉体验的思维定势,在天人协调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并不否认对自然的改造、调节、控制和引导,但其程度限制在“赞天地之化育”的伦理前提下,在天地自然之间,置自己于参赞的位置。因此,尽管中国也有四大发明这样伟大的科技贡献,但受限于既定的思维习惯,缺少不断的超越与发展,缺少考究经验背后根本原因的兴趣,缺少探究“自然之所以为自然”的传统,“开物成务”只是立足于民有所务,“利用厚生”也以足用和尽物之性为原则,致使中国的求是务实精神长期限于农耕式伦理文化的层面而难以突破。所以,中国文化重视追问“人之所以为人”,“成人成己”的德行之知,追求成为圣贤的人生宗旨,影响到方方面面,使求是务实的实用理性也彰显着农业文明时代伦理文化的特有光彩。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概说

中国传统文化饱经沧桑,因不同变故,上下几千年改朝换代频仍,但独具文化精神的中国文化却始终在这块土地上承传,它历数千年风雨而不断维新,保持蓬勃生机,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和同化力量,其中的道理十分耐人寻味。

一、中国文化的萌发与奠基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或人类化。有了人,就有了历史,也开始有了文化。根据目前通行的说法,从猿转变到人,这是两大物质形态之间的转变,是生命物质实现的质的飞跃,而中国文化就产生于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最初使用的工具是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火的使用是人类有决定意义的进步之一,从而最终把人从动物界分离。亚洲人的鼻祖——云南元谋人是否已经学会用火,学术界尚有争议,而距今 5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火,并能有效地保留火种,可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距今约 1 万到 8000 年前,中华先民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制作方式的陶器广泛出现。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7000 多处,其中最著名的类型有仰韶文化(前 5000—前 3000 年,1921 年发现于河南)、大汶口文化(前 4500—前 2500 年,1959 年发现于山东)、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同期,1935 年发现于辽宁)、良渚文化(前 3300—前 2250 年,1936 年发现于浙江)、马家窑文化(前 3000—前 2600 年,1923 年发现于甘肃)、龙山文化(前 2800—前 2300 年,1928 年发现于山东)。

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广泛发现说明,中华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发生,一开始即呈现多元状态,考古学的实证,对传统的中原中心说提出挑战。1977 年,夏鼐发表《碳十四测定年代与中国考古学》,划分中国文明为七大区域。苏秉琦则划分起源期的中国文化为六大区系。与考古学相呼应,神话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也在支持中国文化多元发生的理论。他们把中华民族的远祖粗略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的前夕,黄河流域出现了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首先是炎帝、黄帝联军在涿鹿大败蚩尤,继之,炎、黄二帝发生冲突。阪泉一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从此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经过对东夷集团以及稍后对苗蛮的征战,华夏集团取得连续胜利,从而确立了在早期中华文明多元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从黄帝逐鹿中原到传说中的大禹、夏启,中华文明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然而,其社会组织结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包括各类原始崇拜和巫术在内的精神生活,仍处于十分原始的状态。至殷商西周,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独特风神才开始形成。大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在第十代君王盘庚的率领下,从奄(山东曲阜)迁都到殷(河南安阳),在此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 273 年。这一时期,商王朝的文明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文明水平也大为提高。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的成熟,标志着中国已然跨入了文明社会。同时,以殷为中心的商朝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其浪漫的民族性格和以神秘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尊神重巫,酒池肉林,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特色。所以,《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周人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周是一个历史几乎与商同样悠久的部族,作为偏处西方的小邦,长期附属于商文化。经过数百年的惨淡经营,周民族逐渐强大,公元前 11 世纪,“小邦周”终于取代“大邑商”,建立起周王朝。周朝建立之后,一方面因袭商代的种族血缘统治办法,一方面实行文化主旨上的转换,开始了中国文化史上一次重大的维新运动。